

## 作者简介

卡罗琳·琼·阿克，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卡耐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她以前是马里兰贝瑟斯达国立卫生研究所 20 世纪生物医学科技史的首位小德威特·斯特腾纪念基金学者。1993 年她在圣弗朗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社会问题和科学机遇：美国鸦片制剂成瘾状况，1920—1940 年》。

弗吉尼亚·贝里奇，伦敦卫生和热带病医学学院历史学高级讲师和艾滋病社会史项目主任。她在精神病学研究所成瘾疾病研究室、历史研究所和经济暨社会研究理事会工作过。她为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分部和欧洲委员会提供咨询。她的出版物有《鸦片和人民：19 世纪英国的鸦片制剂使用》（1981 年和 1987 年）（主要作者），《卫生和医学 1750—1950 年》，《剑桥英国社会史》（1990 年），以及《英国毒品研究和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概述》（1990 年）（作为编者和作者）。

安·戴利，精神病学家。她在牛津萨默维尔学院学历史，后来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1953 年获得医生资格。她首先因做母亲和儿童工作而闻名，后来因反对治疗吸毒者的“官方”疗法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而著名。这使她陷入与医学总理事会发生严重麻烦（请见她的著作《一个医生的故事》（1990 年）），她的其他近作是《创造母性》（1982 年）和《利刀下的妇女》（1991 年）。自 1990 年以来，她在韦尔科姆研究所工作，继李斯特之后进行奇特的外科医

学史研究，最近在研究精神病学一些冲突的历史。

- x 埃里克·希克尔是布朗施韦格技术大学副校长和药物暨科学史系主任。出版物包括《Arzneimittel-Standardisierung in den Pharmakopöen des 19. Jahrhunderts i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Grossbritannien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1973年)；“19世纪临床化学的兴起：条件和结果，”收在J.布特纳编的《临床化学史》中(1982年)；《Biochemische Forschung im 19. Jahrhundert》(1989年)作为编者)。

S. W. F. 霍洛韦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他对卫生保健行业的历史感兴趣，最近已发表了一部关于英国皇家药理学政治和社会史的著作。他大部分时间用在莱斯特大学培养研究生。

斯蒂芬·J.库尼茨是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社区和预防医学系教授。他1964年在罗切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1970年在耶鲁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著作有《疾病变化和药品作用：纳瓦霍人经验》(1983年)、《疾病和社会多样性：欧洲人对非欧洲人卫生的冲击》(1994年)，以及《醉里生涯：关于三类纳瓦霍人的一项二十五年后续研究》(1994年)(与杰罗德·E.利维合著)。此外还著有关于疾病史和医学知识社会学的论文。

杰罗德·E.利维自1972年后任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教授与斯蒂芬·J.库尼茨合著《印第安人酗酒：纳瓦霍人的实际情况和盎格鲁美国人的理论》(1974年)和《纳瓦霍人的老化 从家庭到社会公共机构的支持》(1991年)，与雷蒙德·纽特拉和丹尼斯·帕克合著《颤抖的手、狂乱的巫术和蛾子的疯狂：纳瓦霍人精神疾病研究》(1987年)。他还是美国研究学院国家人文基金的前

常驻学者。他在纳瓦霍保留地和纳瓦霍印第安人及霍皮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许多年。新近出版了《重访奥拉维：“平等”社会中的社会阶层》（1992年）。他195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安德烈亚斯·霍尔格·梅赫勒，是英国德拉姆大学医学史的韦尔科姆研究员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无薪教师。他的著作有《Johann Jakob Wepfer (1620—1695) als Toxikologe》（1987年）和《Kritik und Verteidigung des Tierversuchs: Die Anfänge der Diskussio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1992年）。他目前在研究18世纪英国实验药物学的历史。

鲁迪·马蒂，获有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伊斯兰研究的博士 XI 学位。他在丹佛大学教授中东史。他擅长的领域是近代早期伊朗、欧洲扩张史和近代埃及。

约翰·帕拉斯坎多拉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历史学家。他1968年从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做完一年博士后研究，他回到麦迪逊，成为威斯康星的科学史和药物史教员。1983年他担任国家医学图书馆医学史部主任，直到1992年调任现职。他著有《美国药物学的发展：约翰·J. 埃布尔和一个学科的形成》（1992年）。

约翰·斯卡伯勒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药物和医学史教授、古典学教授。他著有《罗马医学》（1969年）《希腊生活面面观》（1976年）《医学术语 古典起源》（1992年）编有《拜占庭医学研讨会》（1985年）和《民俗和民间医学》（1987年）论文集。他还在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古代希腊、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医学、药物学、医药昆虫学和相关问题的论文。

朱迪·斯林，因为在牛津圣安妮学院学的是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她研究商业史和管理，并发表这方面的著作。她关于制药工业的著作包括《梅-贝克历史 1834—1984 年》（1984 年）和《格拉克索到 1962 年为止的历史》（1992 年）（与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合著）。其他还有关于城市法律公司、弗雷什菲尔兹、林克莱特斯-潘恩斯以及克利福德机遇等公司历史的论述。她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兼职任教，并担任新版《英国人名辞典》的副主编。

## 致 谢

XII

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学术部的弗里达·豪泽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戴维斯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致以特别的感谢。



## 序 言

毒品是困扰着当今世界的幽灵吗？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总会像下面一样出现在读报提要中：

毒品案件使社会震惊。有位一流科学家怎样利用牛津大学的实验室，来制造使人精神不正常的非法毒品，而不是救生的药品，他的这一哄动一时的事件震惊了制药界。

《剑桥晚间新闻》，1993 年 11 月 27 日

氟西汀是 90 年代的“特效药”是一种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抗抑郁剂……每种成功的药品都引起争论，但没有一种甚过氟西汀。批评者担心，它可能预示着一个由药物学引起的、令人烦恼的社会控制时代的斗争，正如安东尼·伯吉斯在他的小说《自动人奥兰治》中预想的那样。这似乎有些极端，但氟西汀现在不仅被宣布为抗抑郁剂，而且还被用来治疗人的各种精神失调。与此同时，它引起了那些声称使用此药效果很糟的人们提出的大量诉讼。

《卫报》，1994 年 2 月 4 日

我们每年为小病小痛来买无医生处方的药物花费 10 亿美元。但它们是否确实对我们有所裨益？

《卫报》，1994 年 2 月 8 日

大量售出的毒品可能已在英国杀死了数以百计的人。

《星期日报》，1994年2月27日

毒品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因而具有各种相互影响的不同方面，而不单单是历史方面。关于毒品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各阶段情况，论著很多，但正如本书表明的，主题是它的发展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了解当前的毒品，对阐明其以前的历史极其重要。同样，研究毒品历史对理解我们时代的毒品使用和滥用问题也非常重要。当然，无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今天的状况都无法与过去的相比：

2 在药品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大约主要有 300 种药品 其名称是希腊语、拉丁语、汉语或其他古代语言。直到 19 世纪 关于使用药品和抵制改变天然药品的产品，出现了明显的一致性。一个 18 世纪医生的典型药箱，与一个 13 世纪医生的药箱并无很大区别，除了中世纪的医生不会有来自新大陆的药品，例如秘鲁香脂、菝葜和烟草……这些东西在以植物的一部分闻名时，在医学和化学使化合物分离出来之前很久，就被民间医学发现其医学用途。

对比之下，在另一个意义上说，许多药品对现时代来说又是“新”的。到 1979 年为止，美国最经常开的处方二十五种单一成分药品的 80% 是 1950 年之后被采用的。其中一半是 1960 年以后被采用的。

众所周知，鸦片在毒品历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在论

① J. M. 里德尔：“毒品史研究的方法论”，载于他的交换物《毒品史研究》集注版研究丛书 CS36（大雅茅斯，1992 年）第 15 卷 第 1—19 页（第 12—13 页）。

文集得到多方面的反映。安德烈亚斯-霍尔格·梅赫勒指出，正是 18 世纪的鸦片实验，有力地促进了药物学和生理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它分别导致了对毒品作用的方式和部位的新认识：通过神经直接起作用的观点，让位于通过血液循环系统吸收后传递的观点。再者，它有助于区分‘感受性’概念和‘应激性’概念，为近代生理学的发展和肌肉挛缩的研究有效地奠定了基础。

举另一个较早时代的例子。约翰·斯卡伯勒指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因深知鸦片过量所带来的危险，医生和病人都非常谨慎地使用鸦片。他因而得出结论：“也许我们永远应该根据主导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舆论来解释‘吸毒成瘾问题’”。

当论点已经形成时，就产生了关于造成毒品具体观念的社会类型问题，关于毒品的政策问题，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在各时期又是如何实行和改变的？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主要集中在特定期和典型事例上，剖析围绕毒品的争论和讨论。这些构成了贯穿全书的线索。

本书还揭示“毒品”问题由来已久——毒品（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的地位通常是争论不休的。医学科学试图弄清这种特效物质对生理的、精神的和病理的特性。用户、医生、公众舆论和政府都参与到区分恰当使用和准许使用之中，这些过程往往导致激烈的冲突。关于使用和滥用的界线（个人、医务工作者和制药公司，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开发、制造和销售这些东西，因而在其中有着广泛的金融利益）争论异常激烈。“供替代的”药物就是设法开发更柔和的、更天然的毒品。显然，这些问题今天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一些有害和极易上瘾的东西（如酒、烟）仍旧自由地可以获得，一些凭着医生处方买到，而其他的则是非法

购得的，是国际走私贸易的对象和“反毒战争”的打击目标。

这本历史论文集强调指出，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毒品领域的科技发展是不可阻止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问题是如何迎接像氟西汀这样产品的挑战。正如戴维·罗思曼（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和历史学教授）所说的，人们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日益增强，而问题的解决要求社会的全面改革：

今天我们刚听说氟西汀，明天我们将听到一种新的激素，而后天将听到一种新的基因控制。我能设想严格的规则和程序，但我极难想象它们付诸实施和受到重视。我们需要极不相同的病人和医生，而且我们必须是一个很不相同的种类的社会<sup>①</sup>。

① D 罗思曼：《幸福的人》载 1994 年 2 月 4 日《卫报》。

## 第一章

# 希腊罗马药物中可制鸦片的罌粟

约翰·斯卡伯勒

众所周知，从最远古的希腊史起<sup>①</sup>可制鸦片的罌粟便在制药学和医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使用价值不仅包含着营养学的物质，而且还被当作安眠药和一般性止痛药来经常使用。希腊罗马的医学和药理学对使用罌粟的利弊非常熟悉并能合理使用，而且对其药性知之颇深。罌粟的收获、制作、分类以及在一般药理学和临床治疗上的应用在当时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尽可能做到恰到好处。我们古代的资料再三证明在对罌粟的了解和理解上的这种复杂性，而且希腊罗马的药剂学使长期应用罌粟变得完善了，并尊重多种用法的传统。正当我们在同大多数生物碱这种上瘾的效果作斗争的时候，而这些生物碱都是由生鸦片分解和加工而来，现代的药剂学和医药化学当然还是再次肯定了许多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有人在研究希腊罗马使用鸦片时曾注意到这种‘天然产品’可能使人偶尔上瘾（当然是在自杀时使用）但由于其危险性不如吗啡、可待因、蒂巴因等现代药剂学和医学中的其他鸦片生物碱那么明显，

<sup>①</sup> 关于这方面及有关问题，请见拙作《崇为神圣植物的药理学：芳草和植物根》，载克里斯托弗·A. 法拉翁和德克·奥宾克编：《魔法主教 古希腊魔法和宗教》（牛津，1991年），第138—174页。

因此古人以为他们采集的罂粟胶乳所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其危险性。

荷马史诗是希腊文学中第一个提到罂粟的作品。<sup>①</sup>《奥德赛》里曾提到这种药物可以“平息一切疼痛与争吵”。还听说这种对人有益的物质是取自生长在埃及的一种植物，自从麻醉的罂粟出现以来，这个有点儿离奇的论断就产生在小亚细亚，但是在荷马时代，“埃及制造”的标签在医学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更为奇怪的是，在我们所掌握的希腊资料中，自荷马时代至公元前 5 世纪，关于罂粟的记载是一片空白，其时狄奥夫拉斯图斯在其精湛著作《植物研究》<sup>②</sup>中研究过罂粟，那也只是很简略地介绍了如何从该植物“顶部”提取有用的汁。在希波克拉底文集有 13 处论及鸦片的用处或可制鸦片的罂粟，<sup>③</sup>其中九处归在助产师推荐使用而男性医师极少使用的妇科学系统之中。在公元前 323 年至公元前 1 世纪时期的古希腊，医师已经非常了解鸦片镇静的危险，并增加了迪奥里斯 对迪亚戈拉斯、<sup>④</sup>安德烈亚斯<sup>⑤</sup>和姆奈西迪莫斯

① 荷马：《伊利亚特》第 8 章第 306—307 页；《奥德赛》第 4 章第 220—230 页。

② 狄奥夫拉斯图斯：《历史上的植物》第 9 卷第 8 章第 2 节。见拙作《狄奥夫拉斯图斯论草药书和草药》载《生物学史杂志》第 11 期（1978 年），第 353—385 页。

③ E. 利特雷编：《希波克拉底文集》，10 卷本（巴黎，1839—1861 年）第 10 卷第 725 页。

④ 迪奥斯科里斯，第 4 卷第 64、66 页。著于马克斯·韦尔曼编的 *Pedanii Dioscuridis Anazarbei De materia medica*，3 卷本（柏林，1906—1914，1958 年修订）第 2 章，220—221。

⑤ 尽管韦尔曼信心十足地宣称塞浦路斯的迪亚戈拉斯可能生在公元前 3 世纪，但是这位医师的生平仍存在很大疑问。普林尼《自然史》中大量借用了迪亚戈拉斯的工作成果，而迪奥斯科里斯关于鸦片的理由却与之相悖。M. 韦尔曼：“Diagoras(3)”，*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RE）第 5 章第 1 节（斯图加特，1903），col. 311。

⑥ M. 韦尔曼：“Andreas(11)”，RE, 1, pt2（斯图加特，1894），cols. 2136—2137。

所记下的 对此麻醉品的畏惧心理所作的简要附注，我们还拥有公元前 130 年左右生活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科洛丰的尼坎德尔<sup>②</sup>对致命鸦片过量吸食的恶果所作的更精确的描述。在科尼利乌斯·塞尔苏斯（提比略在位期间，公元 14—37 年）的《医学》一书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可制鸦片的罌粟汁的医学功用，但是“塞尔苏斯从未提到鸦片从其提取的人工栽种的罌粟”。而且此后他“……从未把罌粟汁列入毒药的名单……因而他很可能只知道一种温和的罌粟汁。”<sup>③</sup>塞尔苏斯列出的止痛药里有罌粟汁，但这些淀剂的来源很可能是温和的类似罌粟的麻醉品，而不是麻醉的罌粟。

阿纳扎布斯的迪奥斯科里斯（约在公元 70 年左右）编撰了医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sup>④</sup>他的《药物论》的第 4 章第 64 页（韦尔曼编第 2 章第 218—221 页）第一次很好地总结了罌粟在希腊罗马治疗药物中“作”何用。迪奥斯科里斯在罗马帝国东部几省多年行医时曾频繁使用由罌粟汁不同配制的药物。贯穿于《药物论》的迪奥斯科里斯所记录下的罌粟传统和实践使用方法，往往使人联想到临床观察把民间疗法同严谨的药理学结合起来，而且他给予人极大关注的是此药起何作用。因此，整个《药物论》的创立原理并不体现在植物形态学方面，也不体现在制药学按字母顺序

迪奥斯科里斯引用姆奈西德姆斯的一段文字是关于这位医生的全部资料。姆奈西德姆斯可能是一位罌粟专家。K. Deichgräber: “Mnesidemos(2)”, *RE*, 第 15 章, 第 2 节 (慕尼黑, 1901), col. 2275.

<sup>②</sup> 尼坎德尔, *Alexipharmaca*, 433—64 = A. S. F. 高和 A. F. 斯科菲尔德编, *The Poems and Poetical Fragment* (剑桥, 1953), 122—125.

W. G. 斯宾塞编译, *Celsus; De medicina*, 3 卷本 伦敦, 1935—1938, 第 2 章 46.

参见约翰·斯卡伯勒和维维安·纳顿编, “迪奥斯科里斯《药物论》: 序言, 翻译批评”, *Transaction and Studies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n. s. 4 (1982), 187—227 (187—195)

的一览表上，而是体现在约翰·里德尔深刻察见的一种“药品姻亲关系”体系上<sup>①</sup>，即在病人服用某种特定的药物或其治疗特定的病服用合成剂之后出现的反应。这正是人们在迪奥斯科里斯对罂粟的描述中所见到的蓝图：他先是笼统地介绍罂粟生长的地方（野生的和栽培的），进而极其精确地阐述了此种药物不同形式的一般特性（见希腊 *dynameis*），罂粟不同种类的一些专门名称，鸦片的配  
6 制技术，它对特殊病症的不同用途，鉴定与貌似相像的假鸦片不同的真鸦片，最后我们还拥有古代典籍中关于从罂粟荚中提取胶乳最好的描述。迪奥斯科里斯平素从不例举关于药理学著作权威，这次指出一些很早以前医生完全错误地把鸦片视为一种最危险的药品<sup>②</sup>。“他们这种见解是错的，通过临床经验和观察该药的效果足以把它们驳倒。”迪奥斯科里斯列出的人名有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安德烈亚斯和姆奈西德姆斯，指出至少早在 400 多年前，医药业就对鸦片的广泛使用产生过争论。既然医师和药学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因此在狄奥夫拉斯图斯的名著《植物研究》第 9 章所开列的少数药物中，没有强调鸦片是不足为怪的。与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关于鸦片的论述相比，在迪奥斯科里斯的著作中表明了某些共同的资料来源（没有资料显示老普林尼曾读过迪奥斯科里斯的著作，或迪奥斯科里斯读过老普林尼的著作），<sup>③</sup>至少在药品

① 约翰·M·里德尔，*Discorides on Pharmacy and Medicine*（Austin, Tex., 1985），94—131。

② 迪奥斯科里斯第 5 章，64—66（韦尔曼编第 2 章，221）。

③ 狄奥夫拉斯图斯：《植物研究》第 9 章，12。4=A. F. 霍特编译；《狄奥夫拉斯图斯植物研究》（伦敦，1916 年）第 2 卷，280—281。

参见拙作《普林尼自然史中的药剂学》对物质和来源的某些观察，收在罗杰·弗伦奇和弗兰克·格林威编的《早期罗马帝国的科学：老普林尼、他的来源和影响》（伦敦，1986），第 59—85（特别是第 62 页和第 64 页）。

方面是这样的。迪奥斯科里斯书中有关鸦片的大师名单中，普林尼增加了阿奥拉斯一人，而这个名字曾在迪奥斯科里斯的《药物论》前言中出现过。<sup>①</sup>老普林尼用希腊语提到过“从罂粟荚里提取的药物”即 *dia kōduōn*。<sup>②</sup>而在拜占庭时期医生<sup>③</sup>的著作中还在沿用普林尼的这个术语。在加伦的药书中曾列出过有关鸦片及用罂粟荚制药方面权威的名单<sup>④</sup>，他们从阿斯克列皮阿德斯、特米森，<sup>⑤</sup>直到达莫克拉特斯，还包括罂粟荚诗篇<sup>⑥</sup>出自索拉努斯著作

① 斯卡伯勒和纳顿“迪奥斯科里斯《药物论》序言”第 202 页。

普林尼：《自然史》，第 20 章，第 200 页。

③ 例如 奥里巴西乌斯：《药的采集》第 5 章，第 18—20 页 = J. 雷德编：Oribaii *Collectionum medicarum reliquiae*, 4 卷本 莱比锡，1928—1933 年）第 4 章，132—136（摘自盖伦及费拉格里乌斯的著作）。

④ 盖伦：《与位置相适应的化合麻醉药》（根据强度）第 7 章，第 2 页 = C. G. 库恩编 *Claudii, Galeni Opera omnia*, 20 卷本。22pts（莱比锡，1821—1833 希尔德斯海姆修订，1964—1965）第 8 章，第 38—47 页。在进一步的引文中，盖伦著作的这个版本见于“K.”卷。

⑤ 此处的阿什克勒皮阿德斯可能是比特尼阿（在罗马，公元前 120 年）的阿什克勒皮阿德斯，但是盖伦此处所指更像是药剂师阿什克勒皮阿德斯，即一位生活在韦伯芎和提泰图斯（公元第 69—81）的著名药物专家。法布里吉斯，盖伦 *Exzerpte aus alteren Pharmakologen*（柏林，1972）第 103 页。盖伦：《与位置相适应的化合麻醉药》，第 10 章，第 3 页 = K. 第 8 章，第 360 页，是推测药剂师阿什克勒皮阿德斯生活年代的重要一段。劳第西的特米森生活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公元前 31—公元 14），可能是比特尼阿的阿什克勒皮阿德斯和所谓方法医学派医学学派传说的创始人之一的易变，关于特米森在医学发展方面的作用，请参见 J. T. 瓦兰斯：《比特尼阿的阿什克勒皮阿德斯的最后理论》（牛津，1990）第 141—142 页。

⑥ 盖伦：《与位置相适应的麻醉药》，第 7 章，第 2 页 = K. 第 13 章，第 40—42 页，塞尔维尔乌斯·达莫克拉特斯生活在尼禄和韦伯芎（公元 54—79）统治时期，其著作仅见于盖伦的引文之中。M. 韦尔曼：《达莫克拉特斯（8）》，参照第 4 章，第 2 章（斯图加特，1901）。cols. 2069—70。法布黑吉斯：《盖伦作品摘要》，第 189 页。

的罂粟胶囊的配方，克里汤<sup>①</sup>图拉真的御医和赫拉斯<sup>②</sup>提到的类似的配方，以及盖伦本人对该药的描述。<sup>③</sup> 除了解毒剂，盖伦关于鸦片的用途以及其配制特点的叙述与迪奥斯科里斯的说法极为相似，表明迪奥斯科里斯体现了当时医学界关于鸦片的主要观点，并在公元 100 年之后仍被最有学问的医生所接受和遵循。因此人们可以把迪奥斯科里斯《药物论》第 4 章第 64 页所作的阐述看做是对希腊罗马制药中学对鸦片的特性、作用及用途的深刻理解。此外，迪奥斯科里斯处于罗马帝国医学同早期继承希腊医学实践相结合的过渡阶段。而他书中所引用（为驳斥目的）的迪亚哥拉斯、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安德烈亚斯、姆奈西德姆斯的文字则可令我们一窥有关鸦片及其乳液制作的早期著作的庐山真面目。

7 尽管迪奥斯科里斯是一位娴熟的医药植物学家，但是他对植

伊菲苏斯的索拉努斯（公元 98—117）著作颇丰，流传于希腊的皆是其经典作品，如《妇科学》，以及两篇短文：《骨折的征兆和论绷带》，《希波克拉底的一生》（莱比锡，1927）。人们只是从盖伦的引文中了解到索拉努斯的著作。金德：《伊菲苏斯的索拉努斯》参考第 2 套丛书，第 3 卷，第 1 部分（斯图加特，1927）。C015. 1113—30（1128—9）。克赖顿（公元 96—117）陪同其皇室保护人参加了达西亚战役，是一位古代医师及历史作家。参看我的《克赖顿，图拉真的御医：历史学家和药剂师》，收在约翰·W. 伊迪和乔塞·亚·奥伯编的 *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 Essays in Honor of Chester G. Starr*（拉纳姆马黑兰州，1985）第 387—405 页。

② 卡帕多西亚的赫拉斯生活于公元前 20—公元 20 之间的罗马，见法布黑吉斯《赫拉斯的时代》收于《盖伦作品文摘》第 242—246 页。其著作经常被盖伦引征。赫拉斯曾对药用植物的特性进行过调查研究，是药品和合成药物方面的专家。盖伦《与位置相适应的化合麻醉药》，第 3 章，第 1 页 = K，第 12 章，第 610 页，载有赫拉斯的“治疗一切耳道疼痛和伤口”的多种成分药物的配方，极其相似迪奥斯科里斯的处方第 4 章，第 64.4 页（韦尔曼编，第 2 章，第 220 页）。赫拉斯的配方包括鸦片，但对一部分没药增加了乳香，而省去玫瑰油，而盖伦则认为应该增加玫瑰油这一味药。

盖伦：《与位置相适应的化合麻醉药》，第 7 章，第 2 页 = K，第 8 章，第 43—45 页。

物形态却所言甚少，也许他以为对此感兴趣的任何人可以查阅狄奥夫拉斯图斯的精湛著作《植物研究》。在关于罂粟的开篇，迪奥斯科里斯提出某些品种的罂粟“可以种植于花园之中”<sup>①</sup> 这些观赏罂粟的种子可以制成被营养学家认为是特别有益于健康的面包。如果涂上蜂蜜，这些种子就可以成为芝麻的代用品，称为“通常的罂粟（希腊语为 *thylaktis*）”。<sup>②</sup> 它在其狭长的荚里结着一个白色种子。迪奥斯科里斯懂得，这种白色种子不具麻醉特性，他对这种源于栽培类型的提法，得到现代描述的惊人证实，指出其“种子可用来配制乳剂（最好用白色种子的罂粟）”，<sup>③</sup> 由于这些罂粟种子“不含鸦片因，因而可用来烤在和洒在面包及面包圈上”。<sup>④</sup> 迪奥斯科里斯时代的营养专家深知，这些种子是如何促进健康的，而现代的食品化学家则在罂粟种子的碎粉中发现了大量的卵磷脂。值得注意的是，迪奥斯科里斯所开始的关于可制鸦片的罂粟及其营养用处的部分论述，不仅体现了他的有机的原理，而且也预示了以有益食物的最初篇章编辑医疗手册的快速有效方式。<sup>⑤</sup> 迪奥斯科里斯从观赏品种的罂粟叙述开始，提到希腊罗马人在认识和使用罂粟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人们把它栽培在花园里是为了一般性食用，比如制作面包，提取营养丰富的油，<sup>⑥</sup> 有少数人限于用作

① 迪奥斯科里斯著作 第 4 章 第 64.1 页( 韦尔曼编 第 2 章 第 218 页 )。

② 参见盖伦：《混合剂和草药的特性》，第 7 章 第 12、13 页 = K. 第 12 章 第 72—74 页。

詹姆斯·A. 杜克：《药草手册》( 博卡拉顿 佛罗里达，1985) 第 344 页。收在保罗·G. 斯特克等编《默克索引》第 8 版( Rahway, N. J. . 1986)，第 850 页。

④ 杜克：《药草手册》第 344 页。

如奥里巴西乌斯：《医药的采集》，第 1 卷 = 雷德编的第 1 卷 第 4—27 页。

⑥ 参见杜克：《手册》第 344 页。